

颠覆与传承

论鲁迅的当代意义

陈漱渝等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

颠覆与传承

论鲁迅的当代意义

陈漱渝 等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颠覆与传承——论鲁迅的当代意义/陈漱渝等著.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6. 6
ISBN 7-5334-4430-2

I. 颠… II. 陈… III. ①鲁迅 (1881~1936) — 思想研究②鲁迅著作—文学研究 IV. I2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65121 号

颠覆与传承

——论鲁迅的当代意义

陈漱渝 等著

责任编辑 陈玉龙

封面设计 林小平

版式设计 赵 艺

出版发行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 350001 电话: 0591-83726971
83725592 传真: 83726980 网址: www.fep.com.cn)

印 刷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福州市福新中路 42 号 邮编: 350011)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1

字 数 282 千

插 页 2

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 100

书 号 ISBN 7-5334-4430-2/I·219

定 价 28.00 元

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向出版科 (电话: 0591-83726019) 调换。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鲁迅研究的危机及其生长点	(4)
第二章 挑战经典	(21)
第三章 又起《收获》风波	(39)
第四章 一种更为深层的颠覆	(57)
第五章 神化、世俗化、妖魔化	(80)
第六章 鲁迅人学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88)
第七章 鲁迅的自由观及其当代意义	(101)
第八章 鲁迅诗歌、诗论及其当代意义	(125)
第九章 鲁迅杂文的当代意义	(138)
第十章 鲁迅小说的当代意义	(175)
第十一章 阿 Q 典型的当代意义	(196)
第十二章 鲁迅与当代作家	(244)
第十三章 世界文学中的鲁迅	(269)
附录一：假如鲁迅活到今天 ——鲁迅的文化遗产与当代中国	(285)
附录二：以圣徒般的虔诚修订《鲁迅全集》 ——我参与修订“书信卷”的情况和感言	(305)
后 记	(328)

在世界文化史上有三类文艺家。一类在他们生活的年代一度享有盛誉，但逐渐被读者淡忘了，比如英国戏剧家马洛（1564～1593）。马洛是中世纪戏剧的革新者，他的作品为莎士比亚的创作铺平了道路。马洛的剧本《马耳他岛的犹太人》影响了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他的另一个剧本《爱德华二世》影响了莎士比亚的《理查二世》。但当今的读者大多只知道莎士比亚，却不知道马洛，因此有人把马洛比喻为“皇室的奶妈”——哺育出了像国王般拥有盛誉的文豪，而自己终究相当于一位鲜为人知的乳母。第二类文艺家在生前默默无闻，而死后却声誉日隆。比如德国作曲家巴赫（1685～1750），是近代奏鸣曲的奠基人，他生前鲜为人知，逝世整整一个世纪之后才逐渐被人们发现。中国的曹雪芹多少比巴赫幸运一些，但他的《红楼梦》也是在去世二十四年之后才开始刻印问世。还有一类文艺家，他们的作品既是当代的文化财富，又是后世的精神资源。鲁迅显然应该划归这一类。他生前就是读者的良师益友，死后仍然是我们生活中“缺席的在场者”。完全可以断言，如果没有屈原，没有李白、杜甫，没有曹雪芹、吴敬梓，没有鲁迅、巴金，中国文学史就不可能拥有金字塔般的辉煌。

鲁迅的文化遗产呈现出多方面的特征，粗略概括起来至少有三个：一、惊人的丰富性；二、鲜明的政治性；三、强烈的现实性。

一、所谓丰富性，取决于鲁迅多方面的文化贡献。他是文学家，又是思想家，其思想囊括了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伦理思想、

美学思想、教育思想等等，构成了一个博大的思维世界，积淀成了一座经得起持续开发的宝藏。这样，鲁迅研究就必然成为一种持续性的多视角研究，不同时代的不同视角具有各自的意义和价值，可以相互增补却无法彼此取代。正是这种历时性的多视角研究，使得鲁迅的文化遗产成为了对民族后续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精神资源。

二、政治性。政治是阶级、民族、社会集团之间基于各自根本利益所发生的相互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活动。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它贯穿于不同历史时期，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鲁迅生活在中国遭受列强欺凌、中国人有可能从“世界人”中被挤出的时代。长夜如磐，饿殍遍地，中国民众不仅受到剥削和压迫，连生存权都难以保障，而且受到宗法制度和礼教的精神虐杀。因此，鲁迅的文化遗产与现代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如果排除了宏观的、远大的、深刻的政治意识，我们就无法理解鲁迅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的深刻内涵。大家记忆犹新的是，在极左路线干扰下，一度高喊过“文学从属于政治”或“文学是阶级斗争工具”的口号，抹杀了文学不可或缺的艺术特质，这引起广大读者的反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厌恶和尚而恨及袈裟。政治从来都具有不同的性质，比如，腐败是一种政治现象，反腐败也是一种政治现象。我们不能因为反对“从属论”和“工具论”而在政治跟“政治实用主义”或“极左路线”之间划上等号，完全排除文学作品中或隐或显、或强或淡的政治性。不错，1927年底鲁迅写过一篇文章——《文艺与政治的歧途》，此文提到文艺跟政治经常发生冲突。但这里所讲的政治仅仅是那种维持落后现状、扼杀思想自由的政治，也就是专制政治。只要认真阅读这篇文章，就能发现它本身就是一篇革命宣言，具有极其强烈的政治色彩。当然，鲁迅所说的革命，既包括暴力革命，也包括了和平渐进。

三、现实性。鲁迅进行创作既不沉湎于古代，也不把未来的黄金世界轻易许诺给读者，而是执着于现实，密切关注中国人的生存现状，从现代中国人生存、温饱发展的角度来提出问题，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他揭露那种自以为超然物外的作家，反对那种主张离开人生，专讲“梦”的文学，更不认同把创作单纯当成个人情感宣泄的文艺理论。他明确宣布：“以为艺术是艺术家的‘灵感’的爆发，象鼻子发痒的人，只要打出喷嚏来就浑身舒服，一了百了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且介亭杂文·论“旧形式的采用”》）他热烈号召：“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坟·论睁了眼看》）

正是由于鲁迅文化遗产本身具有的丰富性、政治性、现实性，使得我们研究其当代意义不仅可能，而且必要。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文化遗产的研究通常包含着纯学科研究与该学科当代性研究这两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纯学科研究可以提高学科的学术水平，当代性研究可以使该学科在不断阐释过程中得到价值增值。这种效应可以称之为“箭垛”效应。文化遗产好比箭垛的中心，各种阐释好比是各处射来的飞箭。万箭丛集，蔚为壮观。只要这种当代阐释是从文化遗产的实际出发而不是强加于人，就跟实用主义的歪曲利用划清了界限。比如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原来是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中的一家，今天被称之为原始儒学。但到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就成为了官方学说，为历代帝王所利用，直到上世纪初才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风暴中受到冲击，终止其垄断地位。但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孔子作为伟大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哲学家的地位又被重新确定。不少学者（如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在思考如何在现代中国发挥儒家思想的应有作用。如在市场经济中讲“诚信”，在人际关系中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外敌面前讲“舍生取义”的民族气节，在处理国家利益时讲“先天下之忧而忧”，在处理师生关系时讲“尊师重道”，等等。我想，只要是从儒家思想本身出发，这种现代阐释就不会导致牵强附会。基于这种理解，笔者试图综合运用文学研究和社会学研究的方法，尝试着对鲁迅进行一番当代阐释。

第一章 鲁迅研究的危机及其生长点

1935年12月30日，鲁迅在编讫《且介亭杂文》之后，曾在《附记》中发出了这样的慨叹：“我们活在这样的地方，我们活在这样的时代。”

“我们”是人的复数。所谓“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更是社会存在物，有意识的存在物。而人的意识又不可能脱离其生活的“地方”和“时代”，不论作家对自己的创作动机作何种表述，也不论他的创作追求什么风格，属于什么流派，都不可能不受他置身的时代的影响和制约。同样，对文学的鉴赏和研究也具有特定的时代性，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时尚，有不同的审美需求和价值准则，因而对同一研究对象往往会持不尽相同的态度，也会得出不尽相同或迥然不同的研究结论。

当今我们生活在一个跟鲁迅完全不同的时代，一个鲁迅生前为之向往的“第三样时代”，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为兴旺发达的时代。但是，当代中国在发生重大历史转折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新的情况，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特别是当今颇具影响的消费主义文化、新保守主义思潮、后现代主义理论，不能不对传统的鲁迅研究带来巨大的挑战，不能不向鲁迅研究工作者提出新的要求和任务。

中国2005年的夏季是一个酷热的夏季，桑拿的夏季，也是一个娱乐的夏季。上千万人聚集在电视机前，观看湖南卫视播放的“超级女声”娱乐节目。这个节目一不要国家投资，二不要纳税人承受额外的经济负担，但给举办方和协办方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

益。在总决赛期间，湖南卫视的广告插播费为4.8万元/5秒、7.95万/10秒、11.2万/15秒。蒙牛酸酸乳投入的节目冠名费为2000万元，随后追加的各类宣传费将近8000万。但公司的收益更加可观：在“超女”们开赛的当月，蒙牛所有的库存产品销售一空；新增两条生产线，仍供不应求。移动与联通的收入也令人瞠目结舌：决定冠亚季军人选靠的是800多万观众的手机投票，每条短信收费1元，移动、联通和湖南卫视的一次性收入就多达800万元。参与运作这一活动的天娱传媒制作能赢利多少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但他们发行了一张名为《超级女声，终极PK》的唱片，仅十天之内预售量就达到了60万张。超女们个人的收入也令人艳羡，最近超女赛的冠军李宇春做电脑和糖果的代言人，每次广告费都在七位数以上。此外，有些不法书商未经正式授权就印制了很多粗劣的“超级女声”图书欺蒙读者。这一典型事例表明，当下的文化活动背后有一双经济的巨手掌控着，由一台利润的马达驱动着。当下流行的大众文化，不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左联和延安提倡的那种用通俗形式进行革命教化的大众文化，而是通俗歌曲、时装表演、大众影视、卡拉OK、MTV、足球赛、飙车族、脱口秀……这是一种绞尽脑汁让你开心的文化，千方百计让你把兜里的钱掏出来的文化。这种消费主义文化的冲击力是十分巨大的。

消费主义是消费社会的产物。什么是消费社会，论者之间存在着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消费社会是人们热衷追求消费的社会，有人认为消费社会是人们具有充分消费实力的社会，也有人认为消费社会是生产相对过剩、能够充分满足人们消费需求的社会。但我们必须正视的事实是，我国目前仍然是一个贫富不均的发展中国家，社会群体可分为超富豪型、富豪型、富裕型、小康型、温饱型、贫困型，还不能充分满足不同群体的消费需求。虽然商家为获取利润尽力在刺激消费和引导超前消费，但跟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现阶段的中国社会还只能说是个准消费社会。

尽管中国社会现阶段还没有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消费水平，但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生活已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变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了僵化的计划经济。这种变化给改革开放的中国注入了活力，带来了生机。但由于中国社会由高度政治化转变为无所不在的商业化、时尚化、消费化，自然会给包括鲁迅文化经典在内的严肃文化、精英文化带来冲击，表现为：

一、消费时代是“屏幕时代”，消费文化是“眼球文化”。人们逐渐习惯于以电子或数字媒体为中介的生活，电视娱乐节目几乎占领了人们的业余文化生活。除了电视屏幕之外，还有电脑屏幕、电影屏幕、手机屏幕、电子游戏机屏幕，共同吸引了人们、特别是青年人的眼球。屏幕的空间是无限的，人们的精力与时间是有限的，因此原本钻研经典的人群就被大量分流，能够坚守阅读阵地的人变得微乎其微。此外，接受屏幕传递的时尚信息主要依靠由视觉、听觉产生的官能感觉，而阅读经典则要依靠由视觉引发的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也就是说它具有一种非视觉性，读者要通过语言的媒介进行再思维、再想象、再创造才能有所获益，远远没有接受炫眼的色彩、摇滚的节奏、感官的刺激省心省力。这种接受的艰难性也使得相当一部分浮躁的受众远离了阅读。

二、消费主义文化以金钱和利润为驱动力。金钱象征成功，利润带来财富，因此文化的娱乐功能往往会被凸显，而其审美功能和教化功能往往会被忽略。消费主义的哲学是快乐（爽），而快乐的载体又会被集中于躯体，特别是下半身或女性躯体。隆胸、减肥、文身、整容成为了新的时尚行业，模特儿成为了青春中国的象征。躯体美学化的背后隐藏了精神的平面化，物欲的膨胀掩盖了精神的萎缩。由于消费文化在讲求形象和包装的同时淡化了理想与思想，在打造明星、制造偶像的过程中模糊了名人跟英雄的界限，在刺激生理需求的同时忽视了心理需求，使得文学经典的历史价值和当代意义往往被人贬低。以金庸小说为代表的通俗文学进入了北大的讲坛，美籍华裔学者李欧梵曾以《大话西游》为教材在哈佛大学授

课，周星驰先后被中国人民大学工商学院和西南民族大学艺术系聘为客座教授。难怪有人预言：“21 世纪将成为没有文学经典的世纪。”更为令人忧虑的是，在“快乐哲学”的支配下，历史和经典遭到了“戏说”。为了媚俗，电视编导不惜把《阿 Q 正传》《药》《孔乙己》改写成一部三角恋爱的作品，竟然让阿 Q 与革命者夏瑜共同争夺孔乙己的女儿。于是经典作品中深邃的主题、精湛的艺术荡然无存，改编成为了对经典的亵渎。

“全球祭孔，五洲同风。设奖开坛，薪火传承。”2005 年 9 月 28 日，是孔子诞辰 2 556 周年纪念日，三十四个国家和地区首次联合祭孔。在孔子的故乡曲阜，古乐悠悠，旌旗猎猎。在当地政府官员的主持下，2 556 名代表佩杏黄色绶带参加了祭孔大典。六十四名少年身着明代服装表演了八佾舞，八十人手执书折吟唱了《商颂》。活动持续了大约四小时，据说采用了原汁原味的明代祭孔程序、服饰和乐舞表演。与此同时，韩国、德国、美国、新加坡的有些城市和台湾、香港地区也设立了祭孔分会。据活动的组织者说，开展这种全球祭孔活动是为了寻找治世良药，特别是要用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来遏制霸权主义和恐怖主义。此番盛景真可谓：“千年礼乐归东鲁，万古衣冠拜素王。”

在全球联合祭孔之前，由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成立，以及该校校长纪宝成先生在同年 5 月 26 日的《南方周末》报发表《重估国学的价值》一文，在思想文化界引发了一场争议。纪先生在文章中将百年来“国学地位遭质疑，国学前途遭否定，国学意义遭质疑，国学前途遭抹黑”的状况直接归咎于陈独秀、钱玄同、鲁迅等五四前驱。他说：“即使是像鲁迅这样杰出的思想家，有时也不免对与国学相关联的事物采取片面偏激的态度，如对中医中药的功用一概加以否定，对京剧等传统文娱形式也刻薄嘲讽、无限‘上纲’。总之，在一段时间里，国学几乎成为落后、愚昧的代名词，必须由它来为中国近代以来的衰落与灾难承担总责任。”

许多研究者跟纪先生的分歧，并不在于要不要研究儒学，并不

在于要不要传承中国的文化遗产。历史无法割断，对于春秋战国时期作为教育家、思想家、历史学家、文学家的孔子，应该给予公正的历史评价，这是毫无疑义的。将孔子学说中的某些观念重新阐释后应用于现代社会，对于这种尝试和努力也必须予以应有的尊重。特别是以孔子的名义在全世界广泛传播汉语，更应该予以支持和鼓励。主要的分歧有以下两点：一、如何正确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包括鲁迅）的历史功过？二、如何确定国学的学术边界？不少学者认为，从汉代以后历朝历代崇儒尊孔，都是强化了孔子思想中的糟粕部分，为维持或复辟封建帝制服务。五四前驱者的批孔，矛头实际上并非指向原始儒学及其创始人孔子，而主要是指向拿孔子当敲门砖的历代尊孔者，是指向儒学中抹杀人性尊严和个性价值的一整套等级伦理观念，是指向中国封建社会的“王朝意识形态”。至于国学的范围绝非儒学可以囊括。中国文化固然是以汉文化为主体，但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也不断融合了少数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滋养。就连“国学”这个名词，据专家考据也是日本的舶来品，如同“物理”“化学”等现代词汇多从日本转销而来一样。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文化的精华也并非囊括在几部儒家经典之中，反倒是那些被“罢黜”而被视为异端的思想中，有许多应该继承借鉴的精华。即使在儒家经典中，也有真经与伪经之分。比如蒋庆先生选编的《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读本》中，列在十部儒“经”之首的《孝经》就是借曾参之名撰写的“儒学伪经”。书中宣扬的孝道“始于事亲，终于事君”，说什么“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就都是一些显而易见的封建糟粕。

2005年的祭孔热和近年来持续的国学热不是偶然出现的。这种文化现象是特定国际国内背景的产物，特别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的新保守主义思潮的产物。新保守主义，亦称文化民族主义、文化传统主义、文化守成主义。在汉语语义中，保守的本义是保卫坚守，免其丧失，跟抱残守缺的引申义有所区分。在英文中，

保守 (Conservative) 一词亦无贬义, 比如英国就有著名的保守党。所以从文化保守主义这一名词本身无法判断其理论得失。

新保守主义是一种全球性的思潮, 它主要表现为历史悠久而目前仍是发展中国的学者对本土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比如, 在被称为世界文明发源地的中国、印度和广大的伊斯兰教地区, 新保守主义的崛起成为了一种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这种思潮的一个显著特征, 就是坚持民族本位立场, 力求摆脱西方世界的文化掌控, 极力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中挖掘现代化的精神资源, 走一条不同于西方而独具民族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避免步入把现代化、全球化简单等同于西方化的误区。所以, 新保守主义的出现, 有着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就国内而言, 由于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 引起了世界各国对产生这一奇迹的中国文化土壤的密切关注。因此, 一些以凸显中华文化主体性为己任的学者希望用儒学跟世界文明对话, 同时企图借儒学以古治今: 用“非今”的态度批判当下社会的不良风气, 用“诚信”的观念提高国民素质, 用“尚和”的思想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包括人与自然的“天人合一”和人际关系的“以和为贵”)。

然而, 在批判继承儒家学说的同时, 不应该把儒学的现实应用价值估计过高。想用一种农业社会的精神文化来统摄工业社会或后工业社会的物质文明, 想用一种缺乏近代意义民主观念的学说来推动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想用一种“重道轻器”的轻视科学、鄙视商业行为的思想体系来加速现代化的步伐, 恐怕会显得一厢情愿, 捉襟见肘。

新保守主义的崛起, 使鲁迅的思想和作品受到了质疑和挑战。青年鲁迅是“因为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才远涉重洋赴日本留学的。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 鲁迅参与了对《学衡》派、《甲寅》派的批判。上世纪三十年代, 鲁迅又在一系列杂文中批判了国民党政府的尊孔读经主张和倡导的“新生活运动”。因此, 以新保守主义的价值观相参照, 对鲁迅上述文化活动自然需要重新予以评估。

除了消费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对传统鲁迅研究冲击最大的还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目前有的学者主张称之为“后现代性”。这是一种全球性的文化现象，在中国当下的文化和文学中也产生了它的变体。就广义而言，前文提及的消费主义、新保守主义，其实都可划归为“后现代性”现象。“后现代主义”显然是相对于“现代主义”的一个概念。现代主义出现于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初期，它以尼采、叔本华、柏格森、弗洛伊德等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为其哲学基础，以反传统、反理性、重直觉、重潜意识为其特征。后现代主义则出现于后工业社会。1934年，在费·德·欧里斯选编的《西班牙暨美洲诗选》中就出现了这个名词，但作为一种哲学与文艺思潮，直到上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期才风靡于欧美。由于后现代主义并不是一个完整的、统一的文化运动，因此对它下一个精确的定义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作为一种文化策略，后现代主义强调颠覆性和解构性，呈现出反权力、反神圣、反主流、反英雄化、反统一性、否定一切终极价值的明显特征。作为一种历史观念，后现代主义一方面企图冲破凝固僵化的历史观，另一方面又企图消解社会理性和历史规律，用假定性和隐喻性取代世界的真实性。作为一种文学观念，后现代主义反对形象的明晰性，时间的连续性，在创作中躲避崇高，嘲弄理想，消平价值，游戏人生，流露出更为明显的异化心理、厌世情绪和颓废倾向。作为一种哲学观念和思维方式，后现代主义在理论上主张相对主义、多元主义，强调不确定性，由对外在世界和内部世界的怀疑而导向了虚无。

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晚近期资本主义的深刻危机，引发了广大民众特别是知识界的普遍不满，于是有的后现代主义者把“制度分析”“微观政治”引入文论之中，把文学理论演化为颠覆现行政权和社会结构的综合边缘学科。另一方面，由于现代自然科学迅猛发展，信息爆炸，知识爆炸，现实事物的相对性、非确定性、不完整性不断被揭示，从而动摇了人们固有的确定性的世界观和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由于后现代主义思潮摧毁了资本主

义永恒的神话和西方文化中心论，拓宽了人类思维的空间和观察客观世界的视野，因而具有不可抹杀的合理成分和进步意义。但由于这种思潮过分强调破坏性，忽视建设性，在反对一种片面性的同时又陷入了另一种片面性，在睿智和警世之言中夹杂了不少偏激之词，因此全盘照搬到中国，就容易扬彼之短而弃彼之长，产生跟西方截然不同的社会效果。

还应该清醒看到的是，我国当下学术界对后现代主义理论及流派研究得并不充分，真正懂得解构主义、阐释——接受理论、后殖民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等的学者可说是凤毛麟角。但从 80 年代至今，却从不同地域、不同年龄段的批评者中不时冒出几个酷评家。他们仅仅拾取了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一点皮毛，就急不可待地拿鲁迅当作操刀解构的靶子。他们不惜歪曲事实，断章取义，迷惑读者，制造事端。更有甚者，为了宣泄某种不健康的情绪，竟然指桑骂槐，含沙射影，超越了文艺批评应该遵循的道德底线和学术底线。有些媒体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与“鼠标”，以“多元并存”为借口向这种舆论大开绿灯，而对持不同意见者则予以刁难和压制，对当代精神生态产生了不可低估的破坏作用。

2005 年 9 月 19 日，台湾历史学家、作家、学者李敖从台北经香港飞抵北京，进行为期十天的“神州文化之旅”。他登天安门，游故宫，参观人民大会堂，探望小学时代的师友，并在北大、清华和复旦这三所名牌大学发表讲演。李敖肯定了大陆改革开放之后的深刻变化，旗帜鲜明地批判了台独分子的倒行逆施。他的这些言行都受到了应有的肯定和欢迎。然而，从 2004 年 6 月至 2005 年 8 月，他却在凤凰卫视的“李敖有话说”栏目中频繁攻击鲁迅，主要论点是：

一、由于日文和文言文的双重影响，“鲁迅的中文写得别别扭扭”，“有一种稀奇古怪的、看起来令你非常不舒服的、甚至不通的句子混在里面”。又“只写了四个五个短篇”，“没有长篇小说，所以鲁迅严格说起来，无法成为响当当的文学家”。鲁迅的杂文里没

有资料，“把他那种感情的语言，悲愤的语言，横眉冷对千夫指的语言”都筛掉，“剩下什么都没有了”。

二、“鲁迅的思想是很有问题的”，“他的思想其实是相当贫乏的”。“在《鲁迅全集》里看不到他赞成民主，也看不到他支持议会政治，可是如果没有议会政治，没有民主，哪来的这种现代的政治上的成果呢？”

三、鲁迅“不敢骂日本人，尤其不肯骂内山书店的老板和他的老板娘”。“鲁迅对国民党政府根本不敢碰，根本不敢骂”，“只是中国人整体跟着倒霉，整天来骂中国人”。“中央研究院蔡元培做院长的时候，每个月还送钱给鲁迅，照拿呵”，四年零一个月，总共拿了490两黄金。相形之下，胡适比鲁迅更勇敢，骨头比鲁迅更硬，是站在第一线的。

他讲以上三点，为的是要颠覆和解构毛泽东对鲁迅的基本评价，否定鲁迅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的说法。

此外，李敖还根据他父亲的回忆，说鲁迅待人接物傲气，比如在北大监考的时候，把试卷撒到满地，让学生弓身去捡。又说陈独秀被国民党逮捕之后，鲁迅写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对陈“落井下石”。还说鲁迅著作中夹杂有周作人的东西，是在“吃他弟弟的文章”，等等。这些都是李敖反对神化鲁迅的论据。总之，他希望今天的中国人把鲁迅作为旧时代的包袱抛掉。

不少听众听完李敖的上述讲演感到十分困惑。但较为熟悉鲁迅研究历史和现状的人都知道，李敖的上述说法大多是重复苏雪林、郑学稼、胡菊人、陈炳良、王朔等人的论点，并无多少新意。此外，李敖的讲演不仅有一些语病，如说“考试的试卷”“里面的内心”，这些都是典型的语意重复，而且，还说鲁迅把陈独秀影射为《红楼梦》中的焦大，把胡适的帽子戴在陈独秀头上，“胡冠陈戴”，更是常识性错误。有记者问李敖：“大陆有很多学者是把您当做一个学业切磋的对手看待的，对此您有没有心理准备？”李敖的回答

是：“我认为他们可能搞错对象了。坦白地讲，我不那么重视学术上的讨论。”（《“我今天终于活着回来了”》，2005年9月20日《新京报》）所以，李敖的上述讲演，还是属于后现代版的酷评游戏。在商业化的安排下，李敖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了隐形的商品。

鲁迅研究目前虽然面临着严重的挑战，但崇拜鲁迅的人们无须悲观，因为文学经典是一种具有稳定性和开拓性的作品。由于它关注人类的命运，洞察人的精神状态，能够以其思想的芒刺和叙述的张力通达人的灵魂，因而超越了时间和疆域，使不同种族、国度、语言、宗教、文化背景的读者都能从中获得审美感动和思想启迪。鲁迅作品就是这种蕴涵着永恒智慧的经典。它不仅是东方的瑰宝，而且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它是世界的，但首先是中国的。鲁迅真正懂得中国，懂得中国文化和中国民生的症结，因而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中国文化形象的代言人。尽管中国当下正迅速迈向电子媒介时代，已经拥有了超过一亿人口的网民和三亿手机使用者，但毕竟电子阅读不会因此取代传统的阅读方式。尽管目前已经呈现出键盘代替毛笔、测量美取代感觉美、数据库取代思想的趋势，但鲁迅作品中那种细腻的审美感觉、撼人的批判力量，绝对不是感知模式化、语言程式化的电子传媒所能取代的。它具有不可替代性和唯一性。2004年10月，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曾对大、中学校师生674人进行题为“你喜爱的作家”的问卷调查。初中组鲁迅名列第三，高中组鲁迅名列第五，大学组鲁迅名列第一。说明鲁迅在青年中仍然普遍受到喜爱，而且随着知识水平的提高，对鲁迅的理解会愈来愈深。因此，我们应该对鲁迅文学经典的永恒性满怀信心。

文学经典具有稳定性，也具有开拓性。对文学经典的研究，要把握其历时性与即时性的交汇点，使其恒久的文化意蕴与现实的社会需求有机结合起来，更自觉更积极地回应新时期现代化的思想文化主题。只有这样，像鲁迅著作这样的经典文化才能够在历史与现实、阅读与阐释、接受与深化的互动中得到价值增值，从而使读者感到常读常新，历久弥新。只要我们进行当代阐释时是从鲁迅遗产